

近四十年鴉片戰爭史研究的典範： 評述 Hsin-pao Chang（張馨保），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洪健榮*

書名：*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作者：Hsin-pao Chang（張馨保）
出版地點：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時間：1964
頁數：217

一般視為揭開近代中國變局序幕的「鴉片戰爭」（Opium War, 1839-1842），往往被看作中國近現代化進程的開始，或者中西關係史上突破性的轉折，學者們也多半將此當成「研究近代中國史的起點」¹。長期以來，對於鴉片戰前清廷海禁措施與朝貢制度的考量、中英商貿關係的離合進退、鴉片走私進口和白銀外流數量的分析、政府統治階層對禁煙的態度、戰爭發生的關鍵因素及其過程、各地群眾的抗英行爲、中國戰敗的緣由、戰爭性質與影響的解釋，以及牽涉其中主要人物如道光皇帝、林則徐、黃爵滋、琦善、鄧廷楨、關天培、龔自珍、魏源、姚瑩、耆英、義律、懿律等歷史地位的評價，一直是中外學界議論不休的問題。再者，歷年來學者們的研究方法、觀點、領域與視野，也隨著學科整合或時移世換而有所更迭。至於在檔案史料與論文專書的收集、整理和翻譯方面，屢經史學工

* 感謝李恩涵老師的指導以及張銓津、張凌勳學長與衣若蘭學姊的資料協助，也要感謝吳美鳳、范純武、吳政憲同學提供寶貴的意見。

1 Hsin-Pao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p. viii。中譯本見徐梅芬、蕭致治等譯，《林欽差與鴉片戰爭》（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自序，頁1。

作者的逐步推展，成果斐然，提供了深度研究的有效條件²。近四十年學界相關鴉片戰爭課題的研究，於百家爭鳴、衆說紛紜之中，而能脫穎而出、獨樹一幟者，以張馨保先生 (Hsin-Pao Chang, 1922-1965)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林欽差與鴉片戰爭》) 一書，用力至深，影響甚廣，在鴉片戰爭研究史上樹立起一座光鮮耀眼的里程碑，堪稱劃時代的學術鉅著。

美籍華裔學者張馨保出生於天津市，早年接受中國初、中等教育，一九四六年獲燕京大學新聞學士學位，緊接著擔任天津《大公報》副編輯。這段期間，他逐漸對近代中國史的演變產生興趣。一九四九年赴美國就讀華盛頓州立大學，至一九五八年獲得哈佛大學歷史和東亞語言學博士學位後，進入喬治城 (Georgetown) 大學教授中國語言及文學課程。一九六〇年後執教於愛荷華 (Iowa) 州立大學歷史系，從事中外關係史專題之探究³。累積多年的研究成果，先是於一九五七年發表一篇評介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1954) 的研究回顧，文中倡議中外原始資料和當代學者著述相互參照，以建構真確史實的必要性，同時夾敘其對於鴉片戰史的基本見解⁴。一九五九和一九六二年夏天他埋首英國公共檔案局 (Public Record Office) 所收藏的鴉片戰爭檔案，並陸續發掘新的中文材料⁵，修訂其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隨即經哈佛—燕京學社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暨東亞研究中心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的協助，於一九六四年出版《林欽差與鴉片戰爭》專論 (p. xii)。此書自問世起即深得中外學術界的好評，

2 近三、四十年來中外學界對於鴉片戰爭史的研究概況，參閱 Dilip K. Basu, "The Opium Wa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A Historiographical Note," *Ch'ing-shih Wen-t'i*, vol. 3, supplement 1, 1977, pp. 2-16；龔書鋒、謝維、孫燕京，〈建國三十五年來鴉片戰爭史研究綜述〉，《近代史研究》，1984年3期，頁148-166；孫燕京，〈近五年鴉片戰爭史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1991年1期，頁133-142；牟安世，〈鴉片戰爭研究四十年〉，《歷史教學》，1991年4期，頁24-29；蕭致治主編，〈鴉片戰爭與林則徐研究備覽〉（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

3 以上所述張馨保的生平與學術簡歷，據 *Newslette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vol. 10, No. 4, 1965, pp. 29-31。

4 Hsin-Pao Chang, "Ya-p'ien chan-cheng (The Opium War)," in John K. Fairbank and Mary C. Wright, eds., "Documentary Collection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7, No. 1, 1957, pp. 60-66。

5 同註3，頁30。

享譽國際，普獲推崇，被公認為鴉片戰爭研究中深具權威性及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與美國學者 Frederic E. Wakeman 一九六六年出版的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Berkele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一時瑜亮，各擅勝場⁶。哈佛大學教授、近代中國史權威費正清 (J. K. Fairbank, 1907-1991) 在書中前言讚譽張馨保「深入迄今尚未被運用過的中國史料，比目前為止任何語言所作出的有關鴉片戰爭起源的敘述，更為公正、持平」(p. viii)，此書之卓然有成，由此可見一斑。

二

張馨保在書中爬梳中、英、日、美多國的史料與論著，剖析鴉片戰爭的前因後果，詳細敘述了一八三九年期間，一連串造成中英兩國敵對衝突的主導事件，揭示這些衝突事件所隱含的動機及其責任歸屬，並且以林則徐的歷史角色為中心，針對相關的重要問題作出評價 (p. xi)。作者基本上認為：導致中英雙方衝突的主要動力來自英國的商業擴張，而鴉片貿易是推動其商業擴張不可或缺的一環；中國取締鴉片貿易，等於限制大英帝國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拓展，因此，為鴉片問題而爆發的戰爭是難以避免的，誠如其自序中強調：

就理論性的說法，這是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衝突。當兩種各有其特殊制度和價值觀念的成熟文化相接觸時，必然會引起某些爭執。促使英國人與中國人相互接觸的是商業，鴉片戰爭前十年中英商業最重要的環節是鴉片貿易，中國人努力去阻止這項貿易係戰爭爆發的直接原因 (p. x)。

進而言之，舉凡牽涉法律、道德、政治、經濟和行政諸方面的中英鴉片貿易問題 (p. x)，乃至英國一心一意於治外法權 (extraterritoriality) 的爭取，實乃誘發這場戰爭的決定性因素 (p. 214)。作者以此論點作為整部著作的主軸核心，條分縷析，抽絲剝繭，串聯各章節的安排及其論證。全書除了自序及附錄、注釋、書目之外，正文計分七章。作者在第一章〈舊秩序下的中英接觸〉中首要認為：由於

5 同註3，頁30。

6 田中正俊等著，李少軍等譯，《外國學者論鴉片戰爭與林則徐（上）》（福州：福建人民

西方對國際關係的認知與中國天子以下萬民一體的倫理觀念、政經體制、文化價值系統的差異，加上彼此間存在的語言障礙和不同的法律觀念，免不了引起種種的糾紛。一八三四年東印度公司失去對華貿易的壟斷權後，秉持重商主義且積極於海外擴張的英國自由貿易者，爲了更高的商業利潤，於是挑戰中國傳統朝貢體制暨乾隆朝建立起的廣州貿易制度 (Canton system)，加深了雙方的對立情勢。第二章〈鴉片貿易的興起〉，作者說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中英鴉片貿易急遽增長之際，英國政府和東印度公司出自財政理由，執意維持鴉片生產；英國自由商也基於利益考量，堅決不放棄鴉片貿易。中國政府則因顧慮鴉片戕害國計民生、風俗人心以及「白銀枯竭」的經濟壓力，決定禁絕鴉片的輸入 (pp.49-50)。

在廣州貿易制度下，東印度公司扮演著中英兩國間的緩衝角色；當公司對中國的貿易壟斷權終結時，原本穩定的舊秩序頓時岌岌可危 (p. 51)。中英關係史上的新情勢所衍生的外交危機，即構成本書第三章的主題，作者指出：這時期英國來華的商務總督所面臨的工作，首要與清廷建立直接往來，確立英國政府代表和中國官員之間的平等地位。由於一八三四年律勞卑使團在廣州違反中國的外貿規章，造成中英雙方敵對的緊張狀態。嗣後義律上校爲迎合一些英商的要求，保證在更公平安全的基礎上擴大鴉片貿易，進而影響英國政府對中國採取強硬的行動。這群英商的崛起時機，恰與北京主張加強禁煙者的得勢一致。在第四章裡，作者進一步分析朝野鑿於鴉片走私貿易的迅速擴大，至一八三八年間黃爵滋、林則徐相繼奏陳禁煙的勢在必行，道光皇帝於是派遣林則徐爲廣州欽差大臣，雷厲風行地鏟除鴉片煙毒的禍根。

第五章起焦點集中於林則徐在廣州的禁煙活動，闡述林則徐經由嚴格取締的方式，對待吸食鴉片或與鴉片買賣有關的中國人；採取防備卻不妥協的措施應付違禁的外國人，規勸其放棄非法的鴉片走私貿易。由於中國的法律程序與公平觀念大異於西方，成爲中英解決鴉片爭端的主要障礙。作者隨即在第六章開宗明義聲稱：林則徐沒收英國人的鴉片，不過是虛幻 (illusory) 般的勝利，「沒收鴉片並未使中國獲益，卻成爲英國當局隨後報復的藉口」；義律「放棄鴉片，與其說是被迫的，不如說是刻意的」 (p. 161)。整體而言，林則徐銷毀鴉片並扣留英國商人，具結的要求所衍生的治外法權問題，導致雙方的矛盾難以透過和平的手段來解除，戰爭的陰影因此逐步地逼近。緊接著第七章環繞在戰爭來臨和林則徐下

臺的環節上，作者指出：鴉片戰爭爆發前夕，「幾乎凡對於中國貿易有興趣的英國人」（p. 189），都請求政府採取軍事干預的手段。隨後在外交大臣巴麥尊（Lord Palmerston）等人有力的主導下，促成英國發動戰爭的決定。戰爭的降臨影響道光皇帝看待英國人的態度，為推諉處置不善的責任，林則徐首當其衝，就此罷官，欽差大臣職務由滿人琦善取代。

作者最終闡述林則徐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評價他「是個比曾國藩更為深刻的思想家，卻又是個不如李鴻章精明的政治家」（p. 217）；強調他對於國家的貢獻在於：及時指出了鴉片對人民健康和國家經濟的危害。最後，作者語重心長地總論林則徐的「廣州之行以規劃新的外交政策，係為了將廣州貿易制度改革成更現代化的機構，奠定基礎；更重要的，也為了與西方不可避免且日益增長的接觸，作好準備。從廣闊的意義來看，林則徐的使命並沒有真正的失敗」（p. 217）。基本上，張馨保擺脫往昔歐美學者的負面成見⁷，對於林則徐一生的學養、人格和作為，持以高度的肯定與推崇。

三

張氏行文流暢，敘事詳瞻，綜觀全書論理縝密，鞭辟入裏，往往前呼後應，通體相關，抑且評價公允，發人深省。尤其值得稱述的，在《林欽差與鴉片戰爭》問世之前，中外學界一般認同二十世紀前期 H. B. Morse (1855-1934)、李劍農、J. K. Fairbank 等人對於鴉片戰爭起因與性質的主張：「鴉片提供英國發動戰爭的契機，而不是戰爭的決定因素」；「鴉片戰爭主要是東西文化，特別是顯示中英雙方對國際秩序持兩種看法之間的衝突」⁸。論者或謂，中英武力衝突的根本，不在於鴉片的利害關係；戰爭冠以「鴉片」的稱呼，不盡名實相符。有別於這種偏重文化性因素且帶有批判「中國中心主義」色彩的解釋架構⁹，張馨保

7 參閱《鴉片戰爭與林則徐研究備覽》，頁 183-185。

8 J.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74.

9 秉持這類觀點的論述及其爭議，參閱 Tan Chu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Opium War (1840-1842): A Critical Appraisal," *Ch'ing-shih Wen-t'i*, vol. 3, supplement 1, 1977, pp. 32-46.

嘗試提出商榷並予以修正，一針見血地指出：文化差異雖然是兩國矛盾的背景之一，但僅僅是次要的因素；鴉片貿易才是導致中英交戰的關鍵，無庸置疑也不容否認，這場戰爭的本質是鴉片的問題，係英國帝國主義暨重商主義強勢擴張下的結果，因此，「“鴉片戰爭”一詞，絲毫無不適當之處」(p. x)，這是作者精闢獨到而能推陳出新的學術貢獻。爾後，鴉片貿易問題，從原先中外學界論述戰爭因果的邊陲，躍居核心的位置。學者不論接受、質疑或者辯駁，仍舊需要正視張馨保的見解¹⁰。

張馨保所以能提出一些頗令中外學者信服的觀點和評論，主要由於他的研究整體立足在紮實的史料基礎上，得以透過歷史的想像，溝通古今，洞察當事者所處的時空情境及其心理狀態¹¹。資料完備(exhaustiveness)，取材豐富，舉證充足，可說是本書一項顯著的特點，也是極大的優點，這個部份，正符合哈佛費正清所提倡多元檔案(multi-archives)和多種文字(multi-language)互相參照，以研究近代中國史的方法準則與學術標準¹²。通覽全書，除了參酌中、日、英、美等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之外，更大量運用各國未刊及已刊卷帙浩繁的原始資料，舉要如中國方面的《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清代外交史料》、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阿英《鴉片戰爭文學集》等史料匯編，配合英國外交部檔案(Foreign Office Archives, F.O. 17)、國會文書(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澳門《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包括戰爭前後英方目擊者和當事者的記錄，晚清士大夫的海防史地專著、日記手稿和詩文別集，以及英國與美國商貿公司的檔案¹³，極盡「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之能事。作者慶幸自己「能

10 參閱 Gerald S. Graham, *The China Station: War and Diplomacy, 1830-186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p. 85-97。另詳參 Jack Beeching, *The Chinese Opium Wars* (London: Hutchinson, 1975); Peter Ward Fay, *The Opium War, 1840-1842*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5); Brian Inglis, *The Opium War*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6)。

11 Stanley Spector, "Book Review: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4, No. 3, 1965, pp. 501-502.

12 李恩涵，〈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趨勢與必要參考書目〉，《思與言》，4卷5期，1967年1月，頁17-19。

13 參閱 Hsin-Pao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pp. 273-301.

既從中國又從英國的一方來撰述這段歷史」(p. xi)，綜括中西資料，擺脫片面性的弊端，一方面呈現中國的觀點，另一方面表達西方的看法，參互搜討(cross-examination)，旁徵博引以求其是，提昇了鴉片戰爭史著作的學術水準，也為相關研究立下空谷足音般的模範。費正清推崇他「多年來培養史學研究能力，掌握中英文資料來撰述這部著作，並且全心致力於追求歷史真實，擺脫先入為主的解釋」(p. viii)，洵為確論。

普遍說來，史學的進展主要發軔自史家對於新史料的掌握、方法的創新、視野的拓展甚至理論模式的自我反省與批判。相對而言，研究者或受到既有學養、價值觀念、國族認同、時代意識和社會文化等條件的制約，往往基於各別的前設立場，塑造自己理想中的世代風格與人物形象，影響及歷史解釋的基準面向。對「鴉片戰爭」問題的歧義，即呈顯如此的現象。學者郭廷以清楚地指出雙方立場的不同：「在中國以為是因禁煙而來，英國則認係為商務與政治問題用兵」¹⁴；李國祁教授也認為：「就我國方面而言，是名副其實的。而英國，則欲借此次戰爭來解決一切中英間爭端，鴉片走私不過為其中問題之一而已」¹⁵，由此可見，中英雙方論述的差異，正反映出各自的利害考量。就中國知識份子而言，鴉片戰爭作為近代中國遭受西方列強侵凌的開端，多少使有志之士蒙上一層民族主義式的屈辱與憤慨。執著於救亡圖存的情結，一旦轉化成抨擊帝國主義或刻意追求近代化的意識形態，有時不免與史學求真、存真的精神背道而馳，反構成學術工作的盲點，甚至流於政治宣傳的附庸。歷史研究固然與時局世變、現實環境息息相關，然而，如何與政治宣傳之間尋得一妥善的分野，實有賴於鴉片戰爭史學者深切地反思。張馨保出身五十年代以費正清為首所主導的「哈佛學派」，濡染了費正清開啓運用中國文書檔案研究近代中國史的風氣¹⁶，著重從中國自身立場和內部觀點出發，以探索鴉片戰史的整體意涵。此種趨勢由 Arthur Waley

14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年3版），頁70。

15 李國祁，《中國近代現代歷史的演進》，《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年），導言，頁9。

16 參閱郝延平，《John King Fairbank》，《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4期，民國76年9月，頁64-79；陶文釗，《費正清與美國的中國學》，《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頁148-162。

之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58) 首肇其端，張馨保紹承其緒，推至極致¹⁷。雖然在具體的見解方面，猶不免陷於美國史學界採取「西方衝擊／中國反應」、「傳統／近代」的模式，根據「傳統中國的近代化仰賴於西力震盪」的分析架構¹⁸，來解說近代中國變局的網絡與歸趨，於是他總結「這場戰爭在中國歷史上開創了新紀元，人民就此邁向近代化的途徑。由於中國沉重的傳統與多年的自滿，這一進程必然是長久、曲折且痛苦的。至今中國人不是依舊循著這條道路去回應西方不斷的挑戰嗎？」(p. 217) 但是在基本立場上，仍隱約可以看出他選擇性地跳脫「西方中心」思想籠罩下的框架，轉向「中國中心取向」(China-centered Approach) 的格局¹⁹，學者劉廣京認為《林欽差與鴉片戰爭》一書「最能代表從中國觀點論中國外交史的趨勢」²⁰，此段評語，顯示出張馨保個人的突破及其居功厥偉的貢獻，也連帶呈現了六十年代中後期一場學術史的轉折與發展。

更難能可貴的是，作者身為中國人，早年曾目睹許許多多的同胞和其近親成為鴉片的受害者，使得他「從事這段研究，難以掩抑自己的情感」；縱然如此，仍自覺地超越悲愴與憤懣，「試著避免有意的偏見或片面，並遵循我所認知的歷史研究者的職業規範」(p. xi)，從嚴謹冷靜的學術研究中，化一己之激情為大我之至愛，折衷其間，尋獲一感性與理性的平衡點，成就這部體大思精且兼容並蓄的經典鉅著，足可視為其兼備史家才、學、識、德之具體展現。

17 Hsin-Pao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p. xii。並參閱 Peter Ward Fay, *The Opium War, 1840-1842*, pp. 389-390.

18 美國史學界涉及近代中國史研究在理論模式上的演變，據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9-96。針對鴉片戰爭研究論點的批評，參見安樂博，〈哈佛學派在鴉片戰爭史研究中的模式及近年所受到的挑戰〉，《清史研究通訊》，1987年第2期，頁51-54。

19 參閱 Paul A. Cohen, *Ibid.*, pp. 149-198.

20 劉廣京，〈三十年來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趨勢〉，《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頁307。

四

本書衆舉諸派之說以成一家之長，別識心裁之餘，仍或有美中不足的一點，由於作者主要針對林則徐與鴉片戰爭的背景和前因，至於環繞戰爭的細部過程，以及戰爭的後半部——包括一八四一到一八四二年簽訂南京條約的這段史實，受限於發凡起例的格局，因此著墨未多。這個缺憾，容有待來者借鏡張氏的治學方法，充分應用新近公開及出版的第一手史料如英國外交部檔案 F.O. 17、F.O. 228、F.O. 881/75a、F.O. 881/75b、F.O. 682²¹，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之清代檔案、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民國五十五年編刊的《道光咸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及《四國新檔》，大陸中國史學會主編《第二次鴉片戰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與福建地方史研究室編《鴉片戰爭在閩台史料選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舟山市檔案局等編《鴉片戰爭在舟山史料選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等等，妥善綜合學界前輩的論著成果，掌握學術脈動，擴展輔助學科，採宏觀的視野，從世界看中國；以微觀的角度，由中國看世界，衡量這場戰爭前後政治、外交、軍事、科技、經濟、社會、心理和思想文化各層面的互動關聯，更進一步深化整體研究的內涵與境界。在當前中外學界相關鴉片戰爭的研究風氣漸趨蓬勃之際，有朝一日，媲美甚至超越《林欽差與鴉片戰爭》的論著，或將幡然問世。

《林欽差與鴉片戰爭》出版迄今三十餘載，猶見氣勢磅礴，成就非凡，依然「被認為是學術界一部傑出的作品，至今仍是有關研究鴉片戰爭方面最好的著作之一。其它西方學者在研究鴉片戰爭歷史方面，從來沒有像張氏這樣，運用如此廣博的中、英文資料」²²。回首向往，放眼世界，這部長期以來被指定為近代

21 學者黃宇和根據這批中英外交文件配合其它史料，探討兩次鴉片戰爭的性質並建構出香港割讓的史實，同時也論及近十餘年來多種文字資料的研究趨勢，皆參見氏著《兩次鴉片戰爭與香港的割讓：史實和史料》（台北：國史館，民國87年）。

22 安樂博，〈哈佛學派在鴉片戰爭史研究中的模式及近年所受到的挑戰〉，頁51。

中國史、外交史和鴉片戰史的重要參考書，奠下了我們對於鴉片戰爭史實與解釋的基本認識²³；在方法學和理論架構方面，也不時於潛移默化之中激發後學，開啓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如學者 Tan Chung 重新審度並再次發揮張馨保「鴉片問題是戰爭起源」的卓見，完成 *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Opium War, 1840-42* 一書，促使「鴉片戰爭論獲得嶄新的活力」²⁴。又如一九九五年大陸出版的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得力於張著的啓發²⁵，通篇落實在中外文獻的爬梳，深入戰爭期間清朝與英國軍事力量的比較，琦善與林則徐的再評價，從廣州、東南沿海到長江流域的戰局以至中國與英、美、法三國分別簽訂的條約等專題，提示我們從「再研究」的過程中，重新思考鴉片戰爭的歷史意義²⁶。由於其應用多元化的史料，更兼思辨謹嚴且分析犀利，以致該書成爲近來中國學界涉及此項研究極具份量的著作。前舉的例證，直接或間接地反襯出《林欽差與鴉片戰爭》的學術史意義及其地位。筆者基於「後見之明」認爲：此書的整體貢獻，庶幾爲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的「典範」(paradigm)——據當代科學哲學家孔恩(Thomas S. Kuhn)在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中所提出「典範」的主要涵義：研究者空前的具體成果起著示範性的效應，既帶動了新的研究途徑，也留下一些有待處理的課題，提供後來者在學習範例的經歷中，進行「精煉典範」的常態研究工作²⁷。透過典範論的觀照，《林欽差與鴉片戰爭》的學術價值，更是呼之欲出、豁然彰顯。總而言

23 參閱 Immanuel C. Y.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3rd ed. (H. 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68-195；費正清等著，張玉法主譯，《劍橋中國史·晚清篇(1800-1911)》上冊(台北：南天書局，民國76年)，〈廣州貿易與鴉片戰爭〉，頁215-231及〈建議閱讀書目〉，頁705-708；黃宇和，〈兩次鴉片戰爭性質探索〉，前引書，第2章，頁25。

24 Tan Chung, *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Opium War, 1840-42* (North Carolina: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78), pp. 5-10.

25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店，1995)，著者自認《林欽差與鴉片戰爭》一書「在許多方面對我幫助很大」，頁149。

26 同上，頁1-32，557-586。

27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p. 10-11, 23-28, 35-51。至於典範的呈現與實踐，通常藉助教科書的形式，pp. 136-143。

之，在同類著述中，本書不僅為「研究近代早期之中外關係者必讀」²⁸，也是吾人於今浸淫鴉片戰爭課題的入門圭臬，認知近代中國變局個中堂奧的深刻導引。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在改革開放後的大陸日漸拓展而在臺灣始終相對冷落的鴉片戰爭研究上²⁹，我們希冀「典型在夙昔」的推波助瀾，寄望於當前和未來臺灣學界的共同努力——既窺宮室之美，有志者，亦當若是！

28 李恩涵，前引文，頁22。

29 茲以台灣地區歷年來造就的博碩士論文為例，其中與鴉片戰爭課題直接相關者，據筆者目前所知，為數並不多。參見張炳南，〈鴉片戰爭與中英關係〉，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52年；王友梅，〈鴉片戰爭前英國對華之鴉片貿易問題〉，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63年；秦亞平，〈中英貿易與鴉片戰爭〉，私立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64年；林盛裕，〈論魏源與佐久間象山的海防思想——兼論十九世紀中葉中日兩國的海防暨海防思想〉，私立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6年；周崇愛，〈鴉片戰爭期間(1840-1842)中文(國語)「顯示性」、「預設性」及「隱含性」之語用研究〉，國立政治作戰學校外國語文學研究碩士論文，民國85年；張銓津，〈鴉片戰爭時期的“漢奸”問題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5年。